◆纵　横

西方政要离任后的去向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分为两种，即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指民选的或随执政党上台而被任命的官员。事务官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要求中立，不带政治取向和政治偏见，对政务官负责，职业固定。

政务官由于存在严格的任期制，其从事政务工作只是自己职业经历的一部分，不可能长期担任某一重要职务，并且，往往不到退休年龄就要退出政坛，因而面临选择其他工作的境遇。这一点是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的。中国领导职务虽然现在废除了终身制，一些领导岗位也实行任期制，但是，从事领导职务的官员一般可以轮岗或者异地任职，大多数人通常可以在政府部门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不必另谋出路。西方那些政务官员除了当官，可能还要有点其他本领，离任后才可能做点其他的事情。

有些政要离任后投入慈善事业和致力于增进人类和平的事业。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离任后担任慈善组织——人类栖息地的义工。1982年，卡特在美国设立了卡特中心。2002年，卡特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54岁的克林顿卸任美国总统，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卸任总统。此后，克林顿开始经营自己的“退休生活”，他非常关注艾滋病问题，并通过克林顿基金会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了许多援助。

有些政要在离任后转向商界打拼，这些人不仅可以利用自己宝贵的工作经验从事商务工作，而且大都能获得不菲的收入。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卸任后，很快投身商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聘请施罗德出任其旗下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主席，参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重要天然气管道的修建工作，年薪高达25万欧元。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即所谓“旋转门”限制，规定高级官员离任后有一年的“冷冻期”，不得从事与其原有公务有关联的商业活动。但在遵守此法的前提下，离任政要还是可以或迟或早投身商界的。2000年，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副总统戈尔竞选总统失败。淡出政界之后，戈尔转战商界，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正可谓政坛失利，商场得意。

演讲和写书也是很多西方政要离任后的重要选择。一些西方政要在任职期间本身就是公众人物，有很高的人气，往往也是某一专业领域的知名人士，并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和人生经验。他们通过演讲和写书与公众分享这些知识与经验，很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自己也能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2001年，克林顿卸任美国总统后，经常到国内外进行演讲。他还全力推出过自传《我的生活》，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2009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卸任，尔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文艺青年”。他曾创作了20多幅肖像画，并进行了展出。2011年，小布什的自传《抉择时刻》出版。他又撰写了《41：我父亲的形象》一书。小布什曾在采访中说：“我发现，总统任期结束后的生活妙不可言。”还称自己“爬出了沼泽，再也不会爬回去”。

还有的政界人士离任后重返大学校园，做了大学教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退出政坛后，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不断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从政前就是一名政治学家和智库专家，2009年3月她重归学术圈，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并担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政治家艾伯特·戈尔离任后也担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客座教授。同时，他还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到该校讲授新闻学。（2015年12月22日　中国社会科学网　熊光清）

◆观　点

如何加强政府聘用人员管理

根据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和实践探索，笔者拟把“临时性聘用人员”定义为：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临时聘用，并协助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从事公共管理活动或行政事务的，不列入政府编制的人员，简称“政府聘用人员”。当前，对政府聘用人员进行统一、规范和激励的管理模式创新已经成为未来我国政府加强聘用人员管理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一，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由编制管理部门按照整合优化的原则，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打破条块壁垒，挖掘队伍潜力，重新核算各单位，重点是各街道聘员员额总量、使用时限，固化现有聘用人员数量，为科学设置岗位提供依据。同时，在暂时没有上级聘用人员管理系统的情况下，可以推进本级政府聘用人员信息系统的运行使用，通过系统掌握聘用人员员额、经费、招录和备案等情况，实现政府或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数据统计、信息查询和备案审核等基本功能，从而对聘用人员入口严格把关，形成有效监管，防止无序增长。

第二，重新配置职权。借鉴公务员、职员岗位设置的做法，全面梳理聘用人员岗位职责，重新明确聘用人员工作内容，制作岗位说明书，细化工作指标，明晰工作责任，做到定岗、定人和定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同工不同酬”等潜在隐患。按照岗位设置情况，结合中央社会建设“织网工程”推进实施，由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整合力量挖掘人力资源潜力，释放冗余聘员岗位，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主动授权并依托街道统筹管理，以“一员多岗”的形式灵活处理上级业务考核对人员配置的要求。同时，加强聘用人员业务知识培训，提高相应业务能力，使整合后的聘用人员能够承担整合前各类专项队伍的工作，胜任多岗职责，并对因不符合工作要求而需逐步消化的冗余人员，做好政策解释工作，排除工作隐患。

第三，设置绩效薪酬。全面梳理聘用人员工作职责、岗位，减少业务重叠和职责交叉，科学设定聘用人员的户籍、学历等门槛要求，提高岗位匹配性。同时，提高聘用人员工作要求，强化绩效考核功能，通过发放绩效考核奖金的方式实现“增薪”。

第四，盘活人力存量。妥善处理编外干部职工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工作隐患。严肃人事编制纪律，严禁新增类似人员，固化存量，杜绝增量，同时通过鼓励学历高、素质好的编外干部职工参加公职人员招考、事业单位岗位竞争上岗等方式，通畅渠道，逐步消化。逐步规范编外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理顺社保、公积金缴交及房补发放，尤其是地方各乡镇街道可以根据自身财力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并保持街道间的基本平衡。（2016年1月《中国国情国力》胡晓东）

“新工业革命”需要新制度设计

“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三大战略的结合，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充分释放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三大要素活力。

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局势，中国政府提出了经济升级的若干重大举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点在增加市场创新主体，释放民间创造活力；“互联网+”，立足发挥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市场和体量优势，推动中国整体经济迈向数字化新阶段；“中国制造2025”，强调对既有制造业的改造提升，推动“中国制造”升级“中国智造”，重塑中国新的工业竞争力。

从资本方面来看，首先要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资本更好服务于创新创业、产业升级。要形成一整套有利于风险投资的金融管理和财税体系，加快A股注册制改革，优化新三板等新兴资本市场功能，鼓励企业通过举债等多种手段融资。坚持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发展夹层基金等介于传统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之间的新型融资手段，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次，鼓励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实现并购重组。当前，大量传统产业面临淘汰过剩产能和结构升级的双重任务，强势企业可以通过主导产业整合进程，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市场地位，强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政府要进一步简化对并购领域的各类审查，便利并购贷款运作流程，鼓励企业通过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融资进行并购投资，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从技术层面来看，要重点力推互联网行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向互动。“互联网+”战略，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强化互联网的综合服务能力。而传统行业则需要通过“+互联网”，实现业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实质是工业与计算机技术、工业与互联网、工业与信息的深度交互，未来工业生产将进一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传统工业企业要主动适应这一进程，找准自身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产业链定位，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双轮驱动，实现“自我革命”。

从劳动力层面来看，中国需要从过去高度依赖人口数量的“人口红利”转向更加依靠人口素质的“人力资源红利”。盘活人力资源红利，重点要发掘两种人，第一是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尝试、精于管理的创业者，另一种是掌握专业技术的高端科技人才。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打破条条框框的体制机制障碍，整合资源，推动科技和教育工作相结合，形成“科”“教”合力。要加速国有科研院所的改革进程，有条件的科研院所可通过转企改制等途径，实现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要逐步打破体制内外鸿沟，推动体制内创新资源与创业企业直接对接。

中国适应“新工业革命”，不仅要在国内调动三大要素，也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海外资源。

从宏观上，中国必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重要的参与方和规则的制定者。当前的新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革命，要主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伙伴，共同制定“工业4.0”时代的技术路径和行业标准，避免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处于被动态势。

从微观上，要力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中国企业收购海外具有技术和品牌竞争力的企业，一旦与国内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实现对接，完全可以达到“1+1>2”的效果。中国应为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供更多金融和制度安排上的便利。

总之，“新工业革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为企业升级换代及“走出去”保驾护航。（2015年47期《中国新闻周刊》师愈闻）

◆评　论

以中国理念重塑国际政治话语

作为新世纪以来的又一个多事之秋，2015年是整个世界在回首“战后70年”中再一次审视现实、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也是中国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后付诸全面实践的重要一年。以元首行动为核心，中国外交继续呈现新气象，在理论和实践创新上进一步开拓、升华。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双边、多边场合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论断，中国特色外交思想走向系统成熟。

无疑，作为崛起大国和负责任大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是民族复兴历史命题的应有之义。过去几年，以领导人直接提出、阐释为主要形式，国际政治舆论场中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响亮。迄今，以“三个共同”为理念框架，中国在打造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道路上迈出重要步伐。这对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命运共同”——中共十八大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三年多来，中国最高领导人数十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世界阐明关于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历史方位和历史方向的中国判断。虽然联合国并不是“世界政府”，相对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一种“无政府”社会，但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中，各个行为体之间正在形成日益牢固的深度依存，国与国之间不断出现可以拓展的“最大公约数”。

国际政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描述人类所处的世界。在传统话语中，从人类形成群体并产生纷争直到十七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是所谓国际社会的“第一个时代”，即“丛林时代”。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蛮荒年代。在之后的“后丛林时代”，一定范围的国际秩序开始出现，但“适者生存”仍是普遍规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受剥削、遭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不可能得到尊重。联合国体系的建立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新文明时代”的开启，但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始终存在，人类远未实现“命运共同”。今天高举“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就是倡导一种新型世界观，寻求人类发展的新方向。

“利益共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重大场合使用“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以此形容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互利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也是对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

如何看待国家间“利益”以及由此相生的“权力”，是各种国际政治思潮和流派的根本分野。“资源稀缺”和“无政府”是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对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以“自助形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权力决定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便成为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尽管“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永恒原则，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可能，因为，在深度依存中生长出一种新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强调“利益共同”，就是倡导一种新理性主义，推动符合世界发展大趋势的人类愿景早日实现。

“价值共同”——在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此之前，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虽然后者是“十三五”国家发展战略，但“五大发展理念”走到了人类发展观的最前沿，可谓人类“共同价值”的另一种体现。站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和普遍共识的制高点，中国在以自身发展不断为世界发展增添正能量的同时，正以中国价值为推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2015年第26期《环球》木人）

◆史海钩沉

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70年以来，继1972年发布的《学为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简称富尔报告）和1996年发布的《教育，内在的财富》（简称德洛尔报告）以后第三份重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必定像前两份报告那样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

《反思教育》（下面简称报告）面对世界新的挑战，提出教育应负的责任和教育的变革，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总的精神如报告导言中说的：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报告提出未来教育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报告强调经济发展必须遵从环境管理的指导，必须服从人们对于和平、包容与社会正义的关注。报告认为，人文主义方法可以让教育辩论超越经济发展中的功利主义作用，应对全球学习格局的变化。

同时，要将通常受到歧视的那些人包容进来，包括妇女和女童、土著人、残疾人、移民、老年人以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民众。这将要求采用开发和灵活的全方位的终身学习方法。由此，报告提出，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

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

关于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的理解，报告在最后一章作了详细的解释。我认为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教育的人文主义精神。报告强调教育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教育要尊重生命、尊重公正、平等，使人们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报告提出：“根据当前形势重新审视教育权。”指出：“国际发展讨论常常会将教育作为一项人权和一项公益事业。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并且有助于实现其他各项人权。”这意味着国家要确保尊重、落实和保护受教育权，除了提供教育之外，还必须成为受教育权的担保人。报告认为，要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报告说：“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

二是强调教育的共同利益。报告认为，“共同利益”可以定义为：“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例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报告认为，共同利益的概念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指出，“要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这意味着知识的创造、控制、获取、习得和运用向所有人开放，是一项社会集体努力。报告还说：“教育是社会平等链条上的第一环，不应将教育出让给市场。”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国家要确保教育权的落实。

三是强调多样性、多元化。报告认为，共同利益的含义必须根据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关于幸福和共同生活的多种概念来界定。因此，在尊重基本权利的同时要承认并培养关于环境、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教育作为共同利益应该具有包容性。这里指的是各种社会、民族，特别是弱势群族的文化知识体系。 这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报告强调，教育的确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并要为它们服务。但教育更是人的权利，同时只有人个体得到发展，才能为政治经济服务。

全方位的终身学习方式

报告认为，面临当前的社会挑战，学习方式需要改变，要重新定义学习的概念。学习可以理解为获得信息、认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学习既是过程，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学习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努力。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多方面的现实存在。报告认为，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需要采用开放和灵活的全方位的终身学习方式。

过去，把教育理解为有计划、有意识、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学习。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都是制度化的。但是人的许多学习是非正式的。“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到的许多知识并非有意为之。这种非正式学习是所有社会化经验的必然体验。”所以要重视非正式学习。

报告提出要“反思课程编排”，强调人文主义课程和多元化课程，反对一切文化“霸权”、定型观念和偏见。把课程建立在跨文化的基础上。

当今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消息和知识的途径、交流方式。报告认为，数字技术为表达自由创造了更多机会，“在这个新的网络世界里，教育工作者需要帮助新一代‘数字国民’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应对现有数字技术乃至今后更新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学校教育和教师不会消亡

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学校和教师起什么作用？会不会消亡？报告的回答是否定的。报告提到，现在有些人认为，由于电子学习、移动学习和其他数字技术提供了大量学习机会，学校教育没有前途。但是报告认为，正如富尔报告和德洛尔报告中说的，虽然知识的来源改变了，人们与知识之间的交流互动方式也改变了，但正规教育系统变化缓慢。因此，报告认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并没削弱。学校教育是制度化学习和在家庭之外实现社会化的第一步，是社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学会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不应只是个人的事情，作为一种社会经验，需要与他人共同学习，以及通过与同伴和老师进行讨论及辩论的方式来学习。”这一段话，既说明学校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又说明当代学习方式的变化。学习不是个人埋头读书，需要与同伴和老师共同学习。

当然，数字化、互联网大大拓宽了学习空间，给以课堂为中心的学习带来挑战。报告指出，某些人起初预测，教师职业会消亡，数字技术将逐步取代教师。但报告认为，“这种预测已不再令人信服”，教师应当成为“向导，引导学习者（从幼儿时期开始，贯穿整个学习轨迹）通过不断扩大知识库来实现发展与进步”。因此“所有国家必须仍将有效的教学职业视为本国教育政策的优先事项”。（2016年1月5日《光明日报》顾明远）